

## 从『京华烟云』的女性形象看林语堂的东西文化观\*

송홍호\*\* · 양중석\*\*\*

### 目 录

1. 绪论
2. 『京华烟云』中的典型女性形象分析
  - 1) 姚木兰：新旧交融的现代女性典范
  - 2) 莫愁：儒家礼教的践行者
  - 3) 曼娘：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3. 对东方文化的态度：传承与反思并存
  - 1) 对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传承
  - 2) 批判“性别压迫”与“封建礼教”
4. 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对西方教育与女性意识的肯定
  - 1) 西方教育：观念革新与成长根基
  - 2) 女性意识觉醒：主体价值与自主选择
5. 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相通
  - 1) 文化调和理念
  - 2) 跨文化传播策略
  - 3) 理想人格塑造
6. 结论

### 中文摘要

本文以『京华烟云』为研究对象，聚焦姚木兰、莫愁、曼娘三位典型女性形象，探究林语堂的东西文化观。木兰融合东方儒道智慧与西方现代意识，是“中西合璧”的理想人格；莫愁践行儒家礼教积极面，彰显传统妇德的现代价

\* 이 논문은 2025년도 중앙대학교 연구장학기금 지원에 의한 것임

\*\* 중앙대학교 일반대학원 동북아학과 중국문화산업전공 박사과정생(제1저자)

\*\*\* 중앙대학교 아시아문화학부 중국어문학전공 부교수(교신저자)

值；曼娘则沦为封建礼教牺牲品，揭露旧伦理对女性的摧残。

在文化观上，林语堂对东方文化持“取精去糟”的态度，既推崇道家“顺其自然”与儒家责任担当，又批判封建性别压迫；对西方文化则肯定其教育对女性观念革新与意识觉醒的推动作用。其核心文化理想为“和而不同”的融合，主张以“人的终极关怀”对接东西方文明。本文弥补了前人对女性形象文化视角解读的不足，也为理解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林语堂、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原型、东西方文化交流、文化翻译、性别与文化认同

## 1. 绪论

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跨文化特质的作家和翻译家，其独特的文化身份构成研究其作品的重要维度。他一生受到了多种文化的熏陶，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西方，但他始终保持了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本性，他所推崇道家安身立命的生活哲学，近情疏理的处世之道，都源于他的中国文化本性。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道路是曲折的，而他兼有中西两种文化而难免在对两种文化的吸收与运用上会有矛盾与冲突，<sup>1)</sup>而这种“脚踏东西文化”的人生经历也使其文化观呈现出鲜明的辩证特征。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述：“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种独特的文化中介立场，使其在『京华烟云』的创作中能够以比较文化的视野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

『京华烟云』创作于1938-1939年，是林语堂具有代表性的英文长篇小说之一，也是他在抗战期间向西方世界阐释中国文化的重要尝试。小说以1900年义和团运动至1938年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通过姚、曾、牛三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冲击下的文化变迁，而在这其中也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由于特殊时期的创作背景，这篇小说也承载着向西方

1) 袁文平，「东学西渐中林语堂价值之“再批判”」，《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26期，第16页。

世界阐释中国文化的使命，同时隐含着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深刻思考。

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语境与文化立场，本研究选择女性形象作为切入点，主要基于以下考量：首先，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明确指出：“中国女人不是那么容易受人压迫的女性。女人虽曾受到许多不利的待遇，盖如往时妇女不得充任官吏，然她们仍能引用其充分权力以管理一个家。”<sup>2)</sup>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实际上掌握着家庭的实际权力。这种独特的女性观使其笔下的女性形象超越了简单的性别符号，成为诠释中国文化特质的重要载体。其次，他还在『吾国与吾民』中专门用了“女性型”来形容中国人的心灵，他认为“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sup>3)</sup>他非常赞同女性自身的包容之德，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也契合了社会对女性所起到的价值的肯定。最后，女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处于特殊位置，她们既是礼教规范的主要承受者，又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因此通过女性形象最能折射出文化观念的深层结构。特别是当时正处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交汇下，在多元思潮的影响之下，林语堂创作的女性形象更能体现出现代与传统融合、道家与儒家相容的独特效果。概而言之，在那个时代，林语堂认为完美的女性应该具有“东方文化为体、西方文化为用，儒家思想为表、道家思想为里”的特质。<sup>4)</sup>因此，本文通过对『京华烟云』中姚木兰、莫愁、曼娘三位典型女性形象的深入分析，旨在揭示林语堂如何通过不同女性角色的塑造来呈现其对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判断，以及这些女性形象所蕴含的其“中西合璧”的文化理想。

纵观既有关于『京华烟云』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趋势：在文化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从宏观角度探讨林语堂的“中庸之道”与“文化调和”理念，强调他在东西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也有部分学者聚焦宗教文化角度；在语言与文体研究方面，部分研究聚焦于林语堂中英双语创作的语言特征、文风变异以及

2)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3)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4) 王红，「『京华烟云』中女性人物性格分析及其对文化传播的影响」，『大众文艺』，2016年第11期，第40-41页。

翻译策略；在小说人物与情节研究方面，也有学者关注小说中的家国情怀、士大夫精神与历史意识；在女性形象研究方面，虽然起步较晚，但也逐渐收到关注，多数成果集中于对姚木兰作为“新女性”代表的独立意识有所分析，但多集中于个体性格特征，较少从系统性文化视角进行深入解读。

而在韩国学界，对林语堂的研究始终与中韩文化交流及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脉络紧密相连。早期研究多侧重于林语堂作品在韩国的译介背景与传播路径，虽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对文本内部意蕴的深入解读仍显不足；跨文化视角的研究虽聚焦于其“脚踏东西文化”的立场与文化调和理念，却大多停留于宏观思想梳理，较少将其落实到具体文本的细读之中。具体到《京华烟云》的研究，韩国学界对其中“女性形象”议题已有所触及。例如，김미정 (2002) 在研究林语堂的家族文化观时指出，“小说《京华烟云》的主人公木兰，正是林语堂理想女性形象的具现者”；<sup>5)</sup> 양이수 (2022) 则从比较文学视角出发，以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为对象，围绕蔡万植的《浊流》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探讨了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异同。<sup>6)</sup>然而，这些研究尚未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系统性地纳入整体分析视野，也未建立起“女性形象—文化观”之间的有效关联框架，因而难以深入揭示林语堂借助女性角色所传达的东西文化融合理想。

因此，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与韩国学界现存的研究空白，本文选择以《京华烟云》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分析林语堂如何通过女性角色的命运展现其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与判断。通过探讨女性形象与文化观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试图填补“女性形象如何成为林语堂文化观载体”这一研究空白。

5) 김미정, 「임어당(林语堂)의 가족문화관 - 그의 문화사상의 특징에 대해 -」, 『중국문학』, 제38권, 한국중국어학회, 2002, 243-256쪽.

6) 양이수, 「채만식 『탁류』와 임어당 『경화연운』의 여성상 비교 연구」, 충남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22.

## 2. 『京华烟云』中的典型女性形象分析

### 1) 姚木兰：新旧交融的现代女性典范

姚木兰作为『京华烟云』的核心女性角色，其形象熔铸了东方传统美德与西方现代意识，呈现出多层次的精神内涵，恰是林语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理想的生动载体。

木兰作为道家学者的女儿，自幼受父亲的影响，浸润淡泊名利、追求恬淡的处世哲学中。正因为父亲不为世俗纷扰所动的豁达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她乐观通达、临事不惊的性格底色。在木兰的眼中，“一个万恶不能入侵的世界，自然是一个使人乐观奋斗的美好世界，生活在如此的一个世界的人会有勇气，能奋斗，也能忍受。”<sup>7)</sup>这份对世界的基本信任不仅构成了她积极的人生态度，更成为日后抵御风浪的精神基石。

尽管木兰生于封建思想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但由于优渥的家境与父亲的开明，使她从小接触到了西方教育的洗礼。她不仅能辨识当时极为稀有的甲骨文，还能走进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汲取当时最前沿的思想与知识。在当时的年代，她并未受裹脚之苦，这本身就是对当时封建礼教的无视与挑战。木兰还掌握了许多那个时代女性所鲜有的技能：她会吹口哨，能唱京戏，精于古董的收藏与鉴赏。这些特质赋予了她鲜明的个性和极具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尽管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她却丝毫不带骄矜之气，对长辈恭敬有礼，对仆从真诚平等，显示出修养之深与性情之美。<sup>8)</sup>

木兰虽从小接受新式教育，却坦然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放弃心仪的立夫而选择了荪亚。她以传统宿命观看待婚姻，将这份安排视为天意。嫁到儒家思想浓厚的曾家以后，当她崇尚自由自然的天性与曾家的家风相抵牾时，她默

7)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8) 参阅郭丽，「浅议林语堂笔下的“完美女性”——姚木兰形象」，《青年文学家》，2021年第23期，第158-160页。

默地回归家庭。身为妻子，她恪守本分，对孙亚宽容隐忍，努力维护婚姻，甚至甘愿为出轨的丈夫纳妾，完满解决了丈夫的婚外恋情。<sup>9)</sup>她对公婆侍奉以礼，下对奴婢关切有加，一切应付自如，曾府上下无不对木兰青眼以待。她以道家豁达智慧处世，在战乱中凭藉出色的治家才能逐步掌权。木兰治家张弛有度，既能细致分配家务，又懂得收敛锋芒。她以幽默化解矛盾，以宽容赢得人心，面对账目问题时，仅以微笑示警便树立威信。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家之道，使她完成了向妻子与儿媳的完美蜕变。<sup>10)</sup>

木兰作为传统母亲，虽期盼长子，但也没有因首胎得女而失望。在子女教育上，她既避免了母亲辈重男轻女的偏颇，又在大义面前展现出开明胸怀——支持女儿游行、含泪送子参军。当爱女阿满遇害，她强忍悲痛；面对阿通请缨前线，她强忍着万般不舍，木兰也只说道“好，去吧。”相对于民大义，木兰愿意舍弃小家的安宁。逃难途中，她不仅照料自家儿女，更救助路边产妇，留下地址以待战后团聚。林语堂笔下这位既恪守母职又不失家国大义的母亲的形象，成功扭转了西方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展现了中国女性智慧与胸怀并重的独特魅力。<sup>11)</sup>

姚木兰的形象充分体现了林语堂“融汇东西”的文化理想。她既承袭了传统东方女性的修养与智慧，又具备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这种塑造反映了林语堂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思考，他通过木兰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价值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取舍与调和。木兰身上展现的“儒道互补”特质，正是林语堂心目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写照。

## 2) 莫愁：儒家礼教的践行者

9) 陈瑶，「从姚木兰形象看林语堂的女性想象」，《文学教育(上)》，2019年第10期，第19-21页。

10) 参阅李丹凤，夏雨，「林语堂<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形象再议」，《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8期，第40-41页。

11) 参阅赵慕榕，「林语堂文学作品中中国女性形象的海外传播——以<京华烟云>为例」，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7页。

与姐姐木兰的“兼容并蓄”不同，莫愁的形象更接近儒家礼教塑造的传统范式。她有善良淳朴的性格，也有务实温和的处世方式。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民国女性的另一种精神面貌。

道家命理中，“莫愁是土命，沉稳，安静，圆通，富足。这些特点都很可贵，有福气。她的像是福相。娶了她的男人有福气。”<sup>12)</sup>恰与立夫的“木命”相生相济——正如傅先生所言：“土养木，木就滋长繁荣。”<sup>13)</sup>这种命理上的契合，也在他们婚后的生活中也得到了印证。莫愁虽出身富贵，但她深得母亲持家之道的真传。她精于女红，善于理财，非常具有务实精神。她在嫁妆问题上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小说里写道：“莫愁为人重实际。谈到嫁妆时，她说她用不着很多东西，宁可折成现金。”<sup>14)</sup>姚父亦评价道：“莫愁也比你节省。你妹妹花一千块钱，比你花两千块钱做的事还多。”<sup>15)</sup>这些细节都突出了她的务实与经世之才。

在婚姻生活中，莫愁展现了一位妻子的智慧与温情。她很清楚立夫家境清贫，却依然心甘情愿地承担责任。她用温情支撑丈夫的理想与追求。在学识方面，莫愁能替立夫整理文稿，也能为文章把关。面对危难，她在立夫因言获罪之时，身怀六甲却依旧镇定周旋。这份冷静展现了儒家所推崇的“临大事有静气”。更难得的是，莫愁能理解木兰与立夫之间的情愫。她选择以宽容来维护家庭的和谐。这种“外柔内刚”的智慧，使动荡年代中的小家依然保持安定。命理所说的“土命”，在她身上也得到了印证。莫愁确实成为立夫扎根的沃土。她以传统女性的贤德与智慧，诠释了“贤内助”的真正含义。她既恪守妻子的本分，又保持独立的人格。这种特质与木兰形成互补，共同展示了民国新女性的多元风貌。

莫愁的形象，生动诠释了儒家礼教下的传统女性范式。她在相夫教子中展现出中国妇德的现代价值。与木兰的道家式洒脱不同，莫愁以儒家式的持重与内敛，提供了另一种民国女性的可能性。她恪守儒家的“夫妇有别”，但没有沦为丈夫的附属。她坚持传统的持家之道，却又能用开明的态度面对时代变化。林

12)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13) 同上。

14)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15) 同上。

语堂藉由这一形象说明：真正的传统并不是束缚人性的枷锁，而是能为现代生活提供支撑的精神资源。

### 3) 曼娘：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曼娘作为木兰的挚友，她的命运与木兰、莫愁形成强烈对比。她成为封建礼教吞噬人性的典型悲剧，深刻揭露了旧式伦理对女性的压迫。

她自幼成长于一个旧式儒家的家庭，在严格的传统礼教熏陶下，将“女子无才便是德”“贞节是女德之本”作为终身信条。她一言一行都谦恭有礼、恪守妇德。但这样一个容貌美丽、家境不俗的纯洁女性，最终却成了封建礼教思想的牺牲品，用自己的人生去换取一个世俗认知中完美的女性形象，是她最悲哀、最无奈的选择。<sup>16)</sup>

曼娘的一生，是封建礼教一步步吞噬人性的过程。她作为曾家的长媳，与平亚的爱恋始终不敢越礼一步。最终，她只能以“冲喜”的形式进入婚姻。短短十日的夫妻生活，却成了她一生无法挣脱的枷锁。丈夫去世后，曼娘选择把自己锁进贞节的牢笼。她拒绝改嫁，终生困守在曾家的深宅大院。她用余生去兑现“从一而终”的教条。林语堂曾犀利地指出：“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夺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sup>17)</sup>曼娘正是这句话的残酷印证。她把对贞节的偏执，化作对自由的牺牲。她越是恪守礼教，就越被礼教吞噬。最终，她这个被伦理完全驯化的灵魂，在日军的暴行面前，选择以自缢的方式守住所谓的“贞节”，成为了旧时代最后的牺牲品。

曼娘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她代表了那些被困在封建文化怪圈里的女性。这种异化的生存状态，既是个体的悲剧，也是历

16) 参阅李红梅，「林语堂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描写与价值分析——以〈京华烟云〉为例」，『百花』，2021年第5期，第34-37页。

17) 参阅董丽娜，「论〈京华烟云〉中旧思想影响下年轻女性的悲剧命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3期，第22页。

史文化留下的深刻教训。她的命运与木兰、莫愁形成了鲜明对照。木兰与莫愁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而曼娘却只能成为旧伦理的殉葬者。林语堂藉由这个角色，揭示了传统文化中压抑人性、摧残生命的糟粕。但他并没有否定整个传统文化，而是针对那些被异化的伦理规范进行批判。旧思想终究无法战胜新思想，新的社会风气不会容忍封建愚昧的残余。那些泯灭人性的条条框框，必然会被民主的浪潮彻底冲垮。曼娘的死亡，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像是新思想对旧礼教的最后审判。<sup>18)</sup>

### 3. 对东方文化的态度：传承与反思并存

#### 1) 对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传承

『京华烟云』全书深受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思想的影响。庄子的理念几乎贯穿始终，成为小说的思想基石与叙事主旨。全书分为三部，每一部都以一段庄子语录作为卷首引题。第一卷更以The Daughters of a Taoist（道家女儿）为题，直接点明木兰的道家背景。这种结构安排，不仅展现了林语堂对庄子思想的系统理解与灵活运用，也体现了他试图以东方哲学重构现代生活意义的文学抱负。可以说，道家哲学既是小说的精神骨架，也是其叙事灵魂。正如他在『吾国与吾民』中所强调的：“道教是自始至终罗曼斯的：第一，他主张重返自然，因而逃遁这个世界，并反抗狡夺自然之性而负重累的孔教文化。其次，他主张田野风的生活、文学、艺术并崇拜原始的淳朴。第三，他代表奇幻意象的世界，加缀之以稚气的质朴的‘天地开辟’之神话。”<sup>19)</sup>这种崇尚自然、追求本真、富于浪漫想象的精神，不仅在人物塑造与情节推进中得以具象化，更使『京华烟云』超越时代叙事，成为一部承载道家生命观与宇宙观的文学经典。

18) 同上。

19)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小说对庄子宿命论的演绎尤为深刻，这一主题也构成了林语堂人生哲学的重要维度。以木兰为例，她的命运轨迹充满道家式的隐喻。南逃时，她选择骡子的场景极具象征性。她并不是依靠理性判断骡子的优劣，而是透过面相占卜来决定方向。这个看似偶然的選擇，最终导向与曾家的宿命相遇。后来，虽然她深爱孔立夫，但仍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荪亚。这些选择，都展现出她对道家“顺其自然”的信仰。她坚信“天命”、“运数”、“缘分”的存在，秉持“不争”与“顺性任情”的处世态度。正因如此，木兰在面对人生困境与情感抉择时，始终表现出一种超然与豁达的心境。她的命运选择与人生观念，不是消极的顺从，而是道家哲学中“顺其自然”精神的现实体现。<sup>20)</sup>

这种对道家“顺其自然”的信仰，不仅体现在木兰的命运选择中，而她的生活理想也深受这种信念的浸染。如荪亚所说，木兰是个“小妙想家”，她的内心总是充满了奇思妙想与诗意的构想。她常常幻想着远离喧嚣的都市与世俗的纷扰，过上隐居田园、男耕女织、粗布麻衣的生活。她憧憬那种空旷宁静、纯净自然的世界，在那里可以摆脱人情的重负与权力的牵绊，真正实现身心的自由与安顿。这种生活理念，正深深植根于道家对“返朴归真”与“顺其自然”的价值追求之中。<sup>21)</sup>这种田园梦想，不仅是逃避现实的幻想，更是文化立场与人生哲学的表达。在她看来，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名利，而在于内心的宁静与生命的自在。道家思想为她提供了精神支点，使她即使身处乱世，也能保持从容与安定。

而木兰的身上，还呈现了道家与儒家的融合。她不仅有道家的洒脱，也展现儒家的智慧。儒家强调德与仁，智慧从属其下；道家则把智慧置于更高位置，体现在日常生活、交往言行与艺术创造中。木兰在面对丈夫婚外情时，展现了这种融合。她没有像传统妇人那样忍气吞声，也没有怒火中烧或大吵大闹。<sup>22)</sup>她选择平和心态，智慧地采取“无为而治、以退为进”的方式。这样既保全

20) 张惠平，「从〈京华烟云〉解读林语堂宗教文化思想」，『文学教育（上）』，2013年第11期，第78-79页。

21) 参阅王小燕，「〈京华烟云〉的文化意境及儒道哲学思想」，『海外英语』，2010年第7期，第291-292页。

了家族体面，也维护了自我尊严。最终，荪亚主动结束婚外情，反而“越想越觉得感激自己的妻子，赏识她的胸襟风度。”<sup>23)</sup>木兰的行为方式，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与儒家“中庸之道”的结合。这种“中和之美”，也正是林语堂眼中东方文明的精髓。

## 2) 批判“性别压迫”与“封建礼教”

尽管林语堂在整体文化观上主张中西合璧、调和互补，但他并未因此忽视或回避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别压迫与贞节观念的反思与批判。

在中国最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女性虽然在家庭日常运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其权力的行使却往往不是以“女性主体”的身份出现，而是藉由“丈夫的代表者”这一身份而存在。她们在处理各种家庭事务时，所追求的目标并非个人意志的实现，而是维护家庭的秩序与稳定。因此，即便女性掌握了某种“权”，那也只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结构。<sup>24)</sup>

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姚太太是传统女性角色的典型代表。她一心维系家庭的和谐与安稳，愿意压抑自我、牺牲理想。她毫无保留地敬重并服从丈夫。正因如此，她逐渐失去了主体性，最终沦为丈夫意志的附庸。她的“贤良”并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文化教化与制度规训的结果。她所展现的形象，不过是传统礼教赋予女性的“忠顺”模板。

如果说姚太太体现了传统女性对家庭秩序的被动服从，那么曼娘就是封建礼教最极端的牺牲品。她外表温婉，内心坚韧，但始终恪守礼教。她愿意为“贞节”牺牲幸福，甚至牺牲生命。她不仅成为“贞女”形象的极致体现，也成为男权文化代言的工具。她的一切选择——守节、拒绝再嫁、最后自尽——看似出于

22) 参阅王淑莘，「对悲剧的喜剧性超越——论〈京华烟云〉中的“道家”生存哲学」，《山西能源学院学报》，2022年2月第1期，第86-89页。

23)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页。

24) 参阅徐长勇，「〈京华烟云〉中林语堂女性观的时代先进性研究」，《品味经典》，2022年第20期，第21-22页。

内心的高洁，其实都是在封建规训之下的自我约束。换句话说，曼娘展现的并不是真正的“女性意志”，而是一种由男性中心文化塑造并内化的忠贞幻象。

小说中特别描写了曼娘自缢的一幕。这一场景被赋予了沉重的象征意义。她的死亡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断裂，更揭示了文化悲剧的本质。当国家灾难与女性创伤交织时，传统“贞节”伦理成为压垮女性的另一重暴力。林语堂通过这一描写，展现了两种力量的合谋：一方面是侵略者带来的肉体摧残，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对女性施加的道德审判。因此，曼娘的死亡并不仅仅是民族灾难背景下的一段个人悲剧，它更是林语堂对封建礼教与性别压迫的深度揭露。

#### 4. 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对西方教育与女性意识的肯定

##### 1) 西方教育：观念革新与成长根基

林语堂在审视中西文化时，特别关注西方教育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作用。他认为西方教育在女性成长层面意义重大，可以帮助她们打破传统束缚，培养现代观念。他并没有主张用西方教育完全取代传统教化。他是在反思传统文化弊病的同时，用开放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他强调要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吸收西方的进步思想，为女性的成长提供新的可能。林语堂既不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也不全然批判中国传统。他更希望在两者的融合中，凸显西方教育理念对女性主体性塑造的启发作用。

在『京华烟云』中，姚木兰和莫愁的成长经历就清楚印证了西方教育的影响。木兰自小生活在一个开明的家庭。父亲姚思安拒绝让她缠足，还鼓励她涉猎京剧、古董等多样领域。他同时融入了西式启蒙教育，培养她自由思考与独立表达的习惯。这种教育方式既保留了道家的洒脱底色，又吸收了西方对个体认知和尊重的重视。最终，它塑造了木兰独立的思想判断力和从容的生活态度。莫愁性格温婉内敛，但她同样接受西式教育。她接触了西方的科学与哲

学，学习到民主、自由和平等等价值观。这些理念为她突破传统女性的认知边界奠定了基础。这种精神特质，也深深影响了她们看待人生的方式。

西方教育的力量更清楚地体现在她们的生活实践与下一代的培养上。木兰面对女儿阿满想参与社会运动时，并没有把孩子视为家庭的附属品。她也没有用“父母之命”去压制，而是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与社会参与权，给予理解和支持。这种做法正是西方教育强调“个体自由”和“公民意识”的体现。<sup>25)</sup>同时，木兰和莫愁都主动接纳科学知识和平等观念。她们即使身处传统家庭，也能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她们以开放、理性和自主的姿态面对人生，最终形成了既有文化底蕴又有现代视野的人格特质。在这里，西方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更是撬动传统性别观念的支点。它让女性获得审视自我与社会的新角度。正因为有这种教育背景，木兰和莫愁才能在乱世中保持精神独立和人格尊严。

## 2) 女性意识觉醒：主体价值与自主选择

在西方教育的推动下，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开始突破传统性别符号的限制。她们展现出了鲜明的现代女性意识，这种意识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文化碰撞中确立的主体价值和自主选择。这一点，正是林语堂女性观的核心。通过描写木兰和莫愁，他表达了对西方教育的肯定，也展现了文化融合的理想。他试图藉此颠覆传统文本中的男权神话，并对其进行解构。

木兰的女性意识主要体现在她对“自我”与“他人”的重新理解。作为妻子与母亲，她承担了家庭责任，但始终保持精神独立。面对家庭事务，她能以智慧做出主导，而不是被动顺从。面对子女成长，她不再依循“养儿防老”的功利观，而是将“尊重个体”放在首位。这种态度突破了性别和身份的限制，凸显了现代女性意识的核心——承认女性作为独立主体的价值。木兰也因此成为『京华烟云』中最具现代女性意识的代表。她的成长和教育背景，深刻展现了新旧时代

25) 参阅王燕琪，「论〈京华烟云〉中姚木兰的女性意识」，『汉字文化』，2019年第8期，第41-42页。

的碰撞与融合。

莫愁的觉醒更为内敛和温婉。她在婚姻选择上拒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模式，展现了对爱情与婚姻的理性思考。她与立夫的结合不是基于家族利益，而是基于情感契合和精神共鸣。她并没有把婚姻视为唯一的归宿，而是更重视彼此的尊重与理解。她虽然恪守传统妇德的温婉，但在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立场。她把“情感自主”的观念融入生活，展现出现代女性意识的一种内在坚守。她的柔中带刚，正是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教育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

林语堂通过木兰与莫愁，提出了“女子自由”的女性观。他打破了传统男权话语中“女性依附”的神话，强调女性最核心的权利在于“自主选择”。<sup>26)</sup>这种选择既包含人生道路的抉择，也包含自我价值的确认。女性应该摆脱外在规训的束缚，掌握自己的命运。他推崇的“女子自由”，并不是对传统美德的否定，而是在肯定基础上赋予女性更大的自主权。这种女性观既呼应了西方的解放思潮，又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它既不盲目附和，也不固守旧制，而是展现出一种“温和的觉醒”。这种女性观体现了林语堂的文化融合理想。他希望中国女性能够在尊重个体、追求平等与自由的理念中找到新的发展道路。这种思考，也为后来的女性提供了启示与力量。

## 5. 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相通

在林语堂的文化视野里，东方和西方文明不是对立的两极。它们在有差异的同时，还藏着互补的可能。林语堂既不主张彻底否定传统，也反对盲目照搬西方学问。他更希望在两种文明的张力里，找到一条“和而不同”的融合道路。这种调和文化的智慧，不只是他思想的核心，还在『京华烟云』的叙事肌理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从理念建构到传播实践，再到人物塑造，一步一步展现出东西

26) 参阅姚兰，「从〈京华烟云〉的母亲形象看林语堂的女性观」，《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32期，第28页。

方文化“相融共生”的可能性。

### 1) 文化调和理念

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调和，并非简单的元素拼接，而是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核心，提炼两种文明的共通精神内核，实现“异质同构”。他在『吾国与吾民』中提到了中国人文主义这一定义，为这种调和提供了理论根基：“中国人之人文主义，自有其一定之界说，它包括：第一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点，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第三点，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情理即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义又可以释作普通感性之圭臬。”<sup>27)</sup>这一界定既凸显了中国传统的精神特质，也为对接西方文化搭建了桥梁。

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中，曾长期存在两种极端对立的文化倾向：“或是以西方的价值尺度为标准简单地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所谓的文化激进派；或是死抱住中国传统文化不放，对西方文化采取拒斥甚至诋毁的态度，从而形成所谓的文化保守派。这两者形同水火，在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互相争斗、缠绕和攻伐，成为一股巨大的文化洪流。”<sup>28)</sup>林语堂则跳出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限制，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本质上是发展路径不同，不是水平高低的区别。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和西方人文主义，虽表述不同，但都朝着同一个生命追求：让生命更有尊严、更有温度。

中国人文主义强调“依情理而行”，以“中庸”为圭臬，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包含基于血缘与亲缘的“亲族之爱”；西方人文主义则倡导“个体价值与理性尊严”，主张突破束缚、实现精神自主，核心是对所有个体生命的平等尊重。二者在“尊重生命本质”这一点上高度一致。『京华烟云』中姚木兰救助逃难产妇的情节，就是这种共通性的生动体现：木兰既用儒家“恻隐之心”践行

27)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28) 王兆胜，「论林语堂中西文化的融合思想」，『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第88-92页。

中国人文主义的“情理”，主动帮助不认识的产妇，又用西方人道主义“尊重个体生命”的理念留下地址，希望战后让她们团聚。她没有把关怀只局限在亲友身上，而是把中国人文主义的“亲族之爱”扩展到对陌生生命的关怀，这正是两种人文精神内在一致的体现。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务实智慧”与西方的“科学精神”也并非对立。林语堂认为，道家中对天地运行、草木生长这种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本质上都是“对真理的探索”。莫愁管理财务时，既遵循儒家“勤俭持家”的传统，又用西方会计学“记录收支”的方法管理账目，把嫁妆折算成现金、精打细算，用“中庸”的情理平衡传统习惯和现代理性，打破了“传统即愚昧”“西方即先进”的刻板看法，也从实践层面回应了文化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极端认知。

在提炼东西方文化共同精神内核的同时，林语堂的文化调和绝不是“没有原则的折中”，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选择。对于中国传统，他保留道家豁达、儒家责任这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内核，抛弃像曼娘的贞节悲剧那样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对于西方文化，他吸收“尊重个体”和“理性精神”，拒绝“极端个人主义”和“物质至上”，既不盲目跟从西方、否定传统，也不固守传统、排斥西方。

这种辩证取舍在女性成长议题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林语堂既不主张女性像西方激进女权者那样抛开家庭责任，也反对传统女性“依附男性”的命运。比如木兰，她用道家“顺其自然”的态度接受妻子、母亲的角色，又用西方“个体意识”保持精神独立。她支持女儿参与社会运动，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同时也教育子女“不要忘记家族责任”；面对婚姻危机，她用“中庸”的情理解解矛盾，既保住了家族的面子，又坚守了自己的尊严，实现了家庭责任和自我价值的平衡。

而在教育理念的实践中，姚思安培养木兰的方式堪称典范：他既让木兰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浸润”，学习甲骨文、品鉴古董，传承文化根基，又引入西方的“启蒙教育”，让木兰学习英文、接触西方哲学，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这样既避免了传统教育“重视记忆、轻视思辨”的局限，也避开了西方教育“重视技能、轻

视人文”的缺点，以“情理”为限度，塑造出“有文化根基、有现代视野”的人格，完美解释了辩证取舍的文化智慧。

## 2) 跨文化传播策略

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远不止于对中国历史的简单记述。“尽管他自己说是‘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他是要通过叙述一个个的故事向西方展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方法，他要为‘乡土中国’代言，他要凸显‘中国意识’，他要颠覆‘欧洲关于东方的集体白日梦’。因为，以往的中国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的‘东方’（中国）只不过是西方人‘想象的地域’，是经过了西方人‘东方化’了的‘东方’。”<sup>29)</sup>而在抗战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中西方对彼此的认识还存在很大隔阂。所以林语堂既要传递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又要考虑西方读者的接受习惯，这就使得“平衡文化真实性和西方接受度”成为他创作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正是这种创作初衷和现实挑战的交织，揭示了『京华烟云』的传播核心：它以“故事”为主要载体，以“跨文化对话”为基本原则，试图打破西方世界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让真实、鲜活的东方文明在西方语境里得到理解和共鸣。

林语堂很了解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接纳故事、理解文化，他首先在叙事结构上做出了适配性调整。因此他选择了以家族史诗为故事主线。这种结构和西方读者熟悉的『飘』、『战争与和平』是一脉相承的，能让西方读者快速代入“姚、曾、牛三家的命运”，进而通过家族的变迁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脉络，避免因陌生的叙事形式而产生排斥感。同时小说以“义和团运动”和“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但没有单纯罗列中国历史事件，而是把它们转化为人类共同的战争创伤：北平沦陷时的逃难场景、曼娘在日军暴行下的悲剧结局，这些情节和西方读者经历的“二战创伤”能产生情感共鸣，让中国的苦难不再是“东方特例”，而是人类共有的苦难体验。这种处理既突出了“中国意

29) 李立平，「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1页。

识”，又消除了西方对东方的“异质化想象”，正是对“为乡土中国说话”的实践。

除了叙述结构的适配，对于西方读者所陌生的中国习俗或哲学相关文化元素，林语堂也进行了“文化转译”。为了避免陷入西方“东方化”的认知误区，他特意不进行猎奇式展示，而是挖掘这些元素背后的人类共通情感，结合“中庸”、“情理”等核心概念实现“文化转译”，既传递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又满足西方读者的认知期待。在传统习俗的呈现上，描写中秋这一传统中国节日时，不纠结于“吃月饼、赏月”的流程细节，而是聚焦家庭团聚的核心情感上：姚家三代人围坐在庭院里，分享往事、聊家常。这种“珍视亲情”的情感和西方“圣诞节家庭团聚”的情感核心高度一致，能让西方读者在产生共鸣的同时，理解“中秋”不是异国风情的符号，而是承载中国人情感的文化仪式。在哲学概念的阐释上，林语堂把道家中的“顺其自然”和木兰的人生选择结合起来，解释成“依照情理顺应生命节奏”：比如木兰通过看面相选择驃子、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这些情节把抽象的哲学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实践，同时联系西方“接受现实的理性精神”，让西方读者能以自己的文化经验为参考，理解道家思想不是“神秘的东方玄学”，而是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智慧结晶。

### 3) 理想人格塑造

姚木兰的形象是林语堂“东西方文化融合理想”在文学上的体现，更是他“为乡土中国说话”、“打破西方集体白日梦”的人格载体。在她身上，东方的文化根基和西方的现代精神无缝衔接，她既不是传统的复制品，也不是西方的模仿者，而是扎根东方、面向现代的理想人格，彻底打破了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

木兰的精神内核深植于东方文化土壤，既受道家“顺其自然”和中国人文主义“情理”的滋养，同时融入了西方文化中的坚韧乐观，形成了“在接受中进取”的独特人生态度。道家的“豁达”使她获得了超越困境的力量：在逃难途中，她不仅失去家园，女儿也不幸遇害，但是即便深处绝境，她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面

对未来。这种在苦难中坚守希望的心态，既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韧性，又和西方人文主义“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相通，打破了西方对中国女性“麻木隐忍”的刻板印象。而西方文化中的“坚韧”则让她更主动承担责任：为了救孔立夫，她冒险向军阀求情；为了帮曾家化解财务危机，她积极奔走，主动想办法。这种“为所爱之人挺身而出”的勇气，既包含东方文化中“重视道义”的精神特点，又带着西方文化中“个体意志”的锋芒，证明中国女性不是被动顺从的弱者，而是有主见、有力量的行动主体。

不仅在精神层面，木兰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同样到处都体现着“情理”和现代意识的平衡，是中西方生活智慧的有机结合，向西方读者鲜活地展示了真实的中国人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在家庭角色中，她是贤妻良母，但不被传统模式束缚：作为妻子，她通过鉴赏古董、演唱京剧保持个人兴趣，不沦为丈夫的附属；作为母亲，她尊重女儿参与社会运动的选择，支持儿子参军报国，把西方“尊重个体”的理念融入传统的家庭教育，用“情理”平衡家庭责任和个体自由，打破了西方对中国女性“家庭工具”的片面认知。在个人能力上，木兰更是兼具传统技艺与现代知识：她精通女红、烹饪，将东方生活智慧代代传承；同时还能辨认甲骨文、阅读西方书籍，吸收现代知识；甚至处理家务时，她会用西方“时间管理”的方法规划事务，但也保留“茶道、插花”这样蕴含东方韵味的传统雅趣。这种生活方式的融合证明，中国人的生活不是“西方想象中的落后守旧”，而是传统和现代共生共荣的鲜活状态。

在情感和伦理选择上，木兰同样展现出高超的平衡智慧。她既尊重东方家庭伦理的传统，又坚守西方情感自由的追求，用“中庸”的情理实现责任和自我的和谐统一，彻底摆脱了“非东即西”的选择困境。在婚姻关系里，她接受“父母之命”嫁给荪亚，但没有因此放弃自我：面对丈夫的婚外情，她用智慧化解危机，赢得了尊重；同时，她对孔立夫也保持着精神共鸣的深情。这种丰富的情感维度，不仅打破了传统伦理对女性情感的单一约束，又与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划清界限，展示了中国人情感世界的丰富和理性。在家国层面，她既有参与抗战救济、守护家族文化，践行着东方传统的“家国情怀”，又深刻认同“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具备了西方现代的“公民意识”，把家族荣誉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证明了，中国的家国观念不是“封建忠君思想”，而是个体和集体共同生存的价值追求，进一步打破了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偏差。

## 6. 结论

『京华烟云』中的女性形象，承载了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思考。这些人物不仅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学塑造，也是他文化观念的具象化表达。通过对姚木兰、莫愁和曼娘三位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传承传统文化、扬弃其束缚，如何审慎接纳西方文明，并最终呈现出一种中西融合的文化理想。这种理想既存在于人物的精神底色中，也折射出他对文化生命力的思考。

首先，林语堂通过对三位女性不同命运的书写，展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性吸收的态度。他肯定道家“顺其自然”、“豁达超脱”的哲学，并把这些思想转化为生活智慧。他让木兰在面对命运时展现从容，在处理家庭矛盾时展现“无为而治”的通透。这些情节使古老哲学在现代语境中获得新生。同时，他对儒家礼教中的糟粕保持批判。曼娘的悲剧则成为他批判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特别是戕害女性生命的有力控诉。与此相对，莫愁则展现儒家礼教的积极一面。她务实温和，临事有静气，证明传统并非完全僵化，而是能为现代生活提供精神资源。这三个人物的对照，正好体现林语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其次，林语堂肯定了西方文化在启蒙教育与女性意识觉醒方面的积极价值。他把西方教育看作打破旧束缚的力量，而不是替代传统的工具。西方教育为木兰和莫愁提供了独立思考和现代视野的根基，使她们能够突破传统束缚，在坚守文化本色的同时，追求个体的精神自主与价值实现。她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也注入“个体自由”的理念，突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束缚。在西方教育的推动下，女性意识呈现“温和觉醒”。这正是林语堂“女子自由”观的核心：在传

统根基上吸纳西方的个体尊重和平等理念，塑造一种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精神的女性范式。

最后，这种对东西文化的辩证态度，凝聚为林语堂的“调和论”。他认为东方与西方文明并非对立，而是具有互补与相融的可能。他拒绝全盘否定传统或盲目西化，主张以“人的终极关怀”为核心，寻求“和而不同”的融合路径。林语堂以跨文化叙事策略，他以家族史诗适配西方阅读习惯，将历史转化为人类共同创伤，对习俗与哲学进行“文化转译”来引发共鸣。从而塑造了木兰这一融合道家豁达与西方理性、既扎根传统又面向现代的理想人格，这一形象打破了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成为文化融合理想的具象体现。

综上，林语堂通过『京华烟云』的女性群像，完成了一次对文化选择的深刻探索。他以文学的方式证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可以在个体和社会中实现统一。他强调的“融合”与“转化”，不仅为民国时期的文化转型提供了思路，也为今天的全球化语境提供启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开放和适应，在传承中革新，在兼容中前行。而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正是这种文化理想最鲜活的注脚。

## 參考文獻

-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陈瑶,「从姚木兰形象看林语堂的女性想象」,『文学教育(上)』,2019年第10期。
- 董丽娜,「论『京华烟云』中旧思想影响下年轻女性的悲剧命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3期。
- 郭丽,「浅议林语堂笔下的“完美女性”-姚木兰形象」,『青年文学家』,2021年第23期。
- 李丹凤,夏雨,「林语堂『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形象再议」,『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8期。
- 李红梅,「林语堂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描写与价值分析——以『京华烟云』为例」,『百花』,2021年第5期。
- 王红,「『京华烟云』中女性人物性格分析及其对文化传播的影响」,『大众文艺』,2016年第11期。
- 王小燕,「『京华烟云』的文化意境及儒道哲学思想」,『海外英语』,2010年第7期。
- 王淑苹,「对悲剧的喜剧性超越——论『京华烟云』中的“道家”生存哲学」,『山西能源学院学报』,2022年2月第1期。
- 王燕琪,「论『京华烟云』中姚木兰的女性意识」,『汉字文化』,2019年第8期。
- 王兆胜,「论林语堂中西文化的融合思想」,『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
- 徐长勇,「『京华烟云』中林语堂女性观的时代先进性研究」,『品味经典』,2022年第20期。
- 袁文平,「东学西渐中林语堂价值之“再批判”」,『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26期。
- 姚兰,「从『京华烟云』的母亲形象看林语堂的女性观」,『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32期。

- 张惠平, 「从『京华烟云』解读林语堂宗教文化思想」, 『文学教育(上)』, 2013年第11期。
- 李立平, 「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 华侨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
- 赵慕榕, 「林语堂文学作品中中国女性形象的海外传播——以『京华烟云』为例」, 山西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21年。
- 김미정, 「임어당(林语堂)의 가족문화관 - 그의 문화사상의 특징에 대해 -」, 『중국문학』, 제38권,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2002.
- 양이수, 「채만식 『탁류』와 임어당 『경화연운』의 여성상 비교 연구」, 충남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22.

## Abstract

### Lin Yutang's View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rough the Female Figures in *Moment in Peking*

Song Honghao · Yang Joongseuk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Lin Yutang's cultural vision through the female figures in *Moment in Peking* (1938–1939). Set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drop from the Boxer Uprising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novel traces the fortunes of the Yao, Zeng, and Niu families while simultaneously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 and reflecting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ree representative women. Yao Mulan, embodying a synthesis of Daoist naturalism, Confucian duty, and Western education, represents the archetype of the modern Chinese woman who balances familial responsibility with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Mo Chou, as a practitioner of Confucian ethics, demonstrates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raditional feminine virtues in sustaining the household. In contrast, Man-niang, bound by rigid ideals of chastity and obedience, becomes a tragic victim of feudal morality, exposing Lin's critique of patriarchal oppression.

Lin's cultural stance 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inheritance and reflection. He upheld Daoist harmony and Confucian responsibility while rejecting oppressive customs, and he emphasized the positive role of Western education in enabling women to develop independent thought and agency. Ultimately, he advanced the ideal of *he er bu tong*—"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not as eclecticism but as a human-centered synthesis of East and West. By adopting narrative structures accessible to Western readers and creating characters such as Mulan who "root themselves in the East while aspiring toward modernity," Lin challenged Orientalist stereotypes and proposed a dialectical unity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Key words** : Lin Yuta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emale archetypes,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 Cultural translation, Gender and cultural identity

투 고 일 : 2025. 10. 10. / 심 사 일 : 2025. 10. 15.~ 2025. 11.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5. 11. 20.

